

要理解康德就必须超越康德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学院派哲学的沉闷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活力形成鲜明对照，很多哲学家们归咎为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他们希望在康德哲学中找到哲学发展的新方向。1865年，奥托·李普曼在《康德及其后继者》中说，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虽然只能“提供价廉物美、营养丰富的食物”，但哲学却“完全陷入各门具体科学的泥潭”，或只是作为哲学史而存在，为了拯救哲学，他发出“回到康德去”的号召。新康德主义遂成为德国学院派的主流，从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德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哲学教席都被新康德主义者所占据。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和马堡大学都继承了康德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传统，都有“要理解康德就必须超越康德”的与时俱进精神，西南学派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尤其关心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价值论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

新康德主义的价值论源于赫尔曼·洛采，他在1858年发布的《小宇宙：论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中作出事实、规律和价值三个领域区分。“价值”的概念是康德的“人是目的”命题的引申和发展，包括人格的尊严和正义，但其源泉是“神圣”和“至善”，因此，价值具有终极的意义，事实和规律是获得价值的手段，判断事实和规律的真假也是一种价值标准。洛采认为，在人的经验中，思想概念、事实变化和秩序相互关联，如果只局限于科学经验而排除价值，那将使经验变得不可理解。

文德尔班是洛采的学生，在1894年大学校长就职讲演“历史与自然科学”中，认为不应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而应按照研究目的，划分“规范化科学”与“表意化科学”。前者指按照法则规范研究物质运动的自然科学，后者描写历史上发生的一次性事件。文德尔班指出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是对立的两种思维方式：“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制定物质世界法则的知识不断扩大人对自然的支配，而历史知识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生活。他认为，逻辑学是从个别事例抽象出普遍判断，是自然科学制定规范的工具，而心理学是服从规范的自然科学，两者都不可能成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

那么，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是什么呢？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试图解决文德尔班遗留的问题。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1899）中，他从词源上说，价值是文化所固有的，因此可以把文化称为财富（Güter，“好的”），而自然是事实，并无价值。他说：“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文化价值是大多数人公认的财富，因此，“文化包括了宗教、法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科学的一切对象”，但不包括心理学，因为心理现象是一种存在，“心理生活的规律也就是自然规律”。文化科学的价值与自然科学的规律都是普遍的，两者不是文德尔班所认为的个别与普遍的区别，而是普遍有效与普遍存在的区别。正如自然科学规律概括的是普遍存在，文化科学评价的价值或事实上被所有人普遍公认为有效，或者至少被文化集团的全体成员公认为有效，“文化价值的这种普遍性，使历史概念的形成排除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

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的历史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一样是客观的，正如自然领域有规律以外的事物，历史中也有许多没有意义的事件。历史的个别化方法是“价值联系方法”，它对事实作出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判断，并在有意义的事实中作出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别，经过如此处理的历史事实与特定的价值相联系，揭示历史的本质和意义。这种研究文化是客观的方法，研究

者个人主观评价需要得到文化集团的公认才是有效的，文化科学因而是客观的科学。

李凯尔特明确地把哲学归于文化科学，他看到哲学不能像过去那样构造超自然的学说，“而需要与历史的文化科学本身发生最密切的接触，哲学只能希望在历史的东西中接近超历史的东西。这就是说，对有效性提出要求的文化价值系统，只能在历史生活之中发现”。但是，李凯尔特只是提出了一个任务，他本人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后来的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三卷本的《符号形式哲学》（1923—1929）建立了一个文化价值系统，但不局限于价值论，而是对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全面哲学说明。